

# 西方勞動過程理論 及其中國化

● 王 星

整個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的解釋路徑分為兩個取向：一是強調技術演化、資本管理作用方式等結構性因素對工人行為控制及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二是強調工人主體性的立場，主要分析工人勞動參與過程中的階級行動。

「勞動過程是如何控制的？」這是西方勞動過程理論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圍繞這個問題，整個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的解釋路徑分為兩個取向：一是結構主義解釋，強調技術演化、資本管理作用方式等結構性因素對工人行為控制及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二是強調工人主體性的立場，主要分析工人勞動參與過程中的階級行動。

在此基礎上，筆者將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細分為傳統勞動過程理論和新勞動過程理論兩部分。前者以馬克思和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等人為代表，主要關注於宏觀經濟社會體制與勞動過程特徵之間的相關性問題；後者以布洛維 (Michael Burawoy，又譯布若威) 等人為代表，研究主題轉向微觀主體性或主體間性的問題——勞動過程政治鬥爭場景的展示與分析。當然，新勞動過程理論的主要議題是在挑戰傳統勞動過程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

本文首先對西方勞動過程理論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檢視其在發展過程中的脈絡主線及理論框架內部的衝突。接下來，本文針對轉型期中國勞動過程鬥爭頻繁的事實，反思西方勞動過程理論中國化及其對中國勞動過程研究的重要意義。

## 一 血汗控制與勞動退化

在考察西方的勞動過程理論時，學者一般都會將理論根源回溯到馬克思——《資本論》(*Kapital*) 的核心內容就是討論資本控制下的勞動過程。馬克思對於整個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的奠基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三點：

第一，馬克思首先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野投射到生產工人的勞動過程之中，建立了勞動過程理論的基本框架。通過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的「生產的隱

\* 本文是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企業師徒制與技能形成的社會學分析 (10CSH035)」的階段性成果。

秘之處」——剩餘價值。資本對剩餘價值的無止境追求構成了資本主義發展動力，自由僱傭工人階級作為剩餘價值的生產者受到資本的控制與剝削。由此，資本與勞動對立關係格局的形成，成為整個西方勞動過程理論一直延續的立論基礎。

第二，馬克思規定了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形成展開的條件。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罪惡及勞動的苦難根源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資本家掌握一切生產資料，決定了他們擁有強大的控制權力，而工人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生存資料。私有資本與勞動實現交換的基礎在於自由契約和自由市場的存在。

第三，馬克思把勞動過程和宏觀環境勾連起來，自由市場和資產階級國家成為資本控制勞動過程並剝削工人的幫兇。

因此，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中，資本主義中的階級鬥爭直接內化到勞動過程之中，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實質上也是工人的無產階級化過程。而且，這種性質的勞動過程控制需要如下三個條件來支撐：

第一，激烈無序的市場競爭，形成勞動力自由替代局面，瓦解了工人自我抵抗的基礎，同時也催生了資本在生產勞動過程中的霸權地位。

第二，工人一無所有，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扮演弱勢的僱傭勞動角色，工人階級的無產化成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形成的基本條件。

第三，國家作為外部力量是資本控制勞動過程的工具，其干預生產過程是以保證生產秩序穩定為前提和目標的。

正是基於這些特徵，布洛維將馬克思總結的勞動過程劃歸為「市場專

制」(market despotism) ①。面對這種專制，工人階級的抗爭一直伴隨着勞動過程。工人階級通過共同的(不一定是集體的)鬥爭行為，實現由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向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的轉變。最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通過革命來打破資本主義專制性勞動政體，進而重組勞動過程。因此，在布洛維看來，馬克思設計了兩種對立的生產體制類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在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下，國家和市場的聯合成就了資本的強勢；社會主義體制則沒收了資本，同時也消滅了市場，國家成為全民國家。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的性質：強迫勞動轉變為自願、自覺勞動，勞動由謀生工具轉變為主觀性的歡樂行為，僱傭關係不再存在。儘管馬克思描繪的勞動場景是烏托邦式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集體農莊以及中國的單位制中都可以捕捉到馬克思勞動理論的影子。

布雷弗曼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分析依然延續了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態度②。不同的是，布雷弗曼沒有馬克思那麼犀利和尖銳地強調暴力資本的血腥和殘酷，而是專注於勞動過程中的生產控制權爭奪及其位移軌迹。他通過詳盡的田野材料為我們刻畫了資本如何滲透與控制勞動過程的完整圖景，拓寬了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界限。與此同時，布雷弗曼也為後來勞動過程理論將研究視野聚焦於工廠內部政治鬥爭的圖景規定了方向。

對泰勒主義(Taylorism)管理革命和福特主義(Fordism)生產方式的反思，是布雷弗曼解析勞動過程的起點。通過「局部工人」③和「設計與執行

布雷弗曼專注於勞動過程中的生產控制權爭奪及其位移軌迹。他通過詳盡的田野材料為我們刻畫了資本如何滲透與控制勞動過程的完整圖景，拓寬了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界限。

布雷弗曼指出，在傳統的手工藝生產時期，生產工人壟斷工藝知識，掌握生產過程的控制權；而在資本主義尤其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生產工人的這種控制權被資本剝奪了。

分離」(the separation of the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 ④這兩個概念，布雷弗曼說明了技術專制主義和管理革命對勞動過程產生的社會性結果，以及對工人階級結構本身的影響，為我們揭示了資本如何控制勞動過程的微觀場景。

所謂「局部工人」，是指在勞動過程中無法掌握完整工藝知識和自主控制權的僱傭工人。布雷弗曼認為，「局部工人」的出現「永遠不是工人自願」的，而是資本追逐剩餘價值以及強化控制、提高生產效率的結果⑤。資本通過以下兩步實現「局部工人」的生產：

第一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通過技術革命打破傳統工藝式生產過程，把勞動過程分解為不同的工序；在此基礎上，資本還通過管理革命打破工人對工藝知識的佔有和控制。因此，「局部工人」的產生是從勞動過程的分解開始的，專業化個別分工一方面劃分了生產過程，另一方面工人為了適應重新組織的勞動過程也必須主動局部化。

布雷弗曼更關注資本局部化工人階級的第二步。他以在勞動過程中對整個生產程序知識的佔有程度為標準來界定「局部工人」的概念：在傳統的手工藝生產時期，生產工人壟斷工藝知識，掌握生產過程的控制權；而在資本主義尤其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生產工人的這種控制權被資本剝奪了。

當然，布雷弗曼認為這種過渡屬於「生產過程的進步性轉讓」⑥，但由此對工人階級的重構——「新工人階級」的產生——同樣也是客觀存在的。首先，布雷弗曼沒有否定馬克思根據生產資料佔有關係以及勞動手段

出賣與僱傭關係來界定工人階級，不過他認為這個概念過於泛化，以至於當代社會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已被置於這種境地」。因此，對工人階級定義的界定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揭示目前「工人階級結構合理而有用的圖式」⑦。

其次，「局部工人」這一概念刻畫出了工人階級目前的結構形態。「局部工人」意味着工人階級內部的等級化，造成這一形態的原因有二：一是生產控制權集中向資本，工人被局部化為生產程序上的一個「工具」；勞動過程逐漸客觀化，連接工人階級團結的主觀意識無法形成；二是生產過程工序化導致不同工序的技術等級隨之產生，不同工序的工人地位產生差異，工人階級內部分層呈多元化。

其實，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一書中同樣討論了「局部工人」的問題。馬克思認為在工場手工業階段，工作只不過被分成若干組成部分，由一連串的「局部工人」順次完成⑧。布雷弗曼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忽視了科學管理革命對「局部工人」及勞動過程的影響。那麼，科學管理革命又是如何對「局部工人」及其勞動過程產生影響的呢？這就需要提及布雷弗曼對「設計與執行分離」的分析。

「設計與執行分離」作為勞動過程的指導原則源於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的科學管理革命。泰勒主義對於勞動過程的控制管理有三大原則：一是資本集中各個勞動過程的知識，剝奪生產工人對工藝知識的壟斷；二是專職化的勞動知識集中與生產管理組織；三是利用知識壟斷來控制勞動過程的步驟及執行方式。布雷弗曼將泰勒主義的三大管理原則統稱為「設

計與執行分離」，認為勞動過程在不同的空間場所、由不同勞動者來進行，帶來的結果就是對生產工人的「去技術化」(deskilling) ⑨。泰勒主義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斷定外部性的紀律約束和一般命令是無法真正控制工人的，因為工人可以通過掌握勞動過程來進行機會主義投機。因此，只有深入勞動過程本身，剝奪工人的勞動過程控制權，才能最徹底地保證資本對勞動的有效控制。

必須強調的是，「設計與執行分離」並不意味着生產技術水平的退步⑩，也不是指生產者的技能極端化(skill polarization)。布雷弗曼使用這個概念乃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勞動異化的立場，試圖揭示科學管理革命對勞動過程的影響。在生產過程中，定量和標準化的勞動動作與時間規定，使工人完全成為外界勞動指令的執行者。因而，在這樣的勞動過程中，工人主觀因素逐漸消失，勞動日益客觀化，工人也被異化為勞動機器。布雷弗曼敏銳地意識到標準化的管理方式以及流水線的生產方式背後的支配邏輯是「無所不在的市場」⑪。在經濟理性的邏輯支配下，辦公室的白領工人以及服務業都被納入客觀勞動的運行進程之中，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出現全面的退化。通過這個概念，布雷弗曼戳穿了科學主義的神話，但是他更深刻的憂慮在於對工人階級未來命運的思考，這與馬克思是一致的。

馬克思揭示了資本控制勞動過程的動機，而布雷弗曼則為我們刻畫了資本控制勞動過程的策略手段。不過他們在以下三點上是基本一致的：

第一，工作場所(工廠)最顯著的特徵不是韋伯的科層制模式，也不是人際關係學派所堅持的那種非正式關

係體系，而是「一個權力體系、一個階級對抗的場所」⑫。這為勞動過程理論後來轉向勞動政治、工廠政體分析做了鋪墊。

第二，馬克思和布雷弗曼都運用宏觀的整體性分析視角，注重暴力資本與勞動的整體性對立。他們是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基準來分析資本主義勞動過程。這樣的宏大敘事一方面掩蓋了資本具體控制手段的演變歷史，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資本控制類型的空間性，即忽略了在不同經濟體制和社會環境下，勞動控制手段的多樣性。

第三，二人都忽略工人階級的主體性。抽象的勞資對立原則抽離了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忽略了勞動的主觀性面向。這往往被視為是傳統勞動過程理論的一個硬傷，成為後來理論批評的主要根據。

如果我們把工人階級分為主觀階級和客觀階級兩個面向的話，那麼布雷弗曼的勞動過程理論主要關心的是客觀工人階級。其實，他本人並沒有無視工人階級的主觀面向，不過他認為討論勞動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地位變遷及其動因更有意義⑬。因此，布雷弗曼筆下的勞動控制問題是在一般意義上探討的，即整體的資方對應整體的工人階級。

儘管傳統勞動過程理論中對主體的忽略問題在學界一直存在着爭議，但是循此方向，衍生了大量的研究。對勞動過程中工人主體性行為的探索，極大地豐富了勞動過程理論的內涵，也符合真實的社會生活經驗。而且，也只有有在工人主體和工廠結構之間的互動過程中，勞動政治方有衍生之土壤。但對勞動過程中工人主體性的過份追求，導致勞動過程理論日益精細，愈來愈強調性別、籍貫以及心

儘管傳統勞動過程理論中對主體的忽略問題在學界一直存在着爭議，但是循此方向，衍生了大量的研究。對勞動過程中工人主體性行為的探索，極大地豐富了勞動過程理論的內涵。

雖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新勞動過程理論是從批評傳統勞動過程理論中的「主體性忽略」問題開始的，但筆者以為，新勞動過程理論更重要的意義是對傳統勞動過程理論「泛階級化」立場的調適。

理認知等因素對勞動過程的影響。筆者以為，在穩定常態的工廠體制下，這一研究思路比較適用。但對於轉型中的工廠體制而言（如中國的單位制工廠）則不盡然，因為在外部條件發生變動的情況下，片面討論模型內在因果機制往往會導致結論重點的偏差。

從1990年代開始，西方勞動過程理論出現一股自我反思的潮流，重新思考勞動過程理論研究核心的問題。這導致理論研究內容及方法悄然發生三方面的改變：一是基本上拋棄了工人主體和工廠結構在勞動政治中「孰輕孰重」的爭論（如愛德華茲[Richard Edwards]曾辯論是工人反抗決定了工廠政體模式<sup>⑭</sup>），轉而認為勞動政治鬥爭與工廠政體之間存在着相互形塑的關係；二是調整「衝擊—回應」式的簡單思維，逐漸走向互動的辯證思維。對勞動過程中工人主體性的討論，最初往往集中於描述工人反抗資本控制的鬥爭策略（與此對應的是，對資本管理控制策略的討論），雖然凸現了工人階級的主觀性面向，但是弱化了傳統勞動過程理論中馬克思提出「能動主體」（工人）概念的政治意義，使現實中的客觀問題逐漸讓位於理論邏輯上的推理；三是調整勞動過程理論關懷點，部分張揚傳統勞動過程理論對宏觀結構問題的思考，如布洛維所言，工作現場是和更大範圍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變遷連接起來的<sup>⑮</sup>，對微觀車間的研究有助於我們透視宏觀的政治經濟條件。

## 二 滿意控制與勞動參與

討論勞動過程中工人參與問題，實質上同樣是「主體性」問題。不過筆

者需要強調，如上文所言，這裏的工人主體性變量的引入，不是意圖說明傳統勞動過程理論框架中「忽略了甚麼」，而是要解釋不同理想類型的主體性的行為生發和作用背後的結構邏輯。如此定位主體性研究，對於透視轉型過程中的工廠政體變遷更有意義。

雖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新勞動過程理論是從批評傳統勞動過程理論中的「主體性忽略」問題開始的，但筆者以為，新勞動過程理論更重要的意義是對傳統勞動過程理論「泛階級化」立場的調適。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研究取向的轉移是基於這樣的事實：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科技的進步，生產流水線設備以及生產程序標準化程度提高（如福特主義、泰勒主義等），一方面導致工人階級結構發生了轉型，同時也對工人的技能水平要求更高。

第二，資本的全球化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發生了改變，大量外包生產方式及資本主義全球生產鏈條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內的勞資矛盾形式。

第三，資本主義體制的擴展，尤其是在1980年代末期，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威脅逐漸減弱，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優勢日益穩定和鞏固，環境、秩序以及發展等問題逐漸代替了原來的階級鬥爭主題。

新勞動過程理論架構是在布洛維勞動過程研究「三部曲」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sup>⑯</sup>，因此，筆者選擇布洛維的理論為代表，對新勞動過程理論進行述評。

在《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一書中，布洛維正面回應了傳統勞動過程理論中的「主

體性忽略」問題。他認為在工作現場，工人的相對自主性往往來自於生產時的技術關係，只有通過這種生產過程中的相對自主性，才能重新確立理論研究中工人階級的真實的主體性。立足於自身的田野經驗，布洛維針對傳統勞動過程理論提出了兩點質疑：第一，在現實的生產過程中，工人勞動參與性很高，工作非常賣力，因此在工作現場中，體會不到傳統勞動過程理論提到的工人被壓迫性；第二，資方—勞方的對立衝突在工作現場中同樣覺察不到。那麼是甚麼機制製造了工人的甘願？是甚麼掩蓋了資本剝削的暴力本質<sup>⑦</sup>？在《生產的政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工廠政體》一書中，布洛維深化了《製造甘願》的研究主題，通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體制的比較研究，總結了五種控制勞動的工廠政體類型<sup>⑧</sup>。

與馬克思不同，布洛維不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中，通過「集體工人的產生」、工人的同質化和階級鬥爭，能夠使工人認清自己的利益和資本的利益的根本對立。在他看來，這僅僅是馬克思理論的「想像性建構」。相反，在實際的工作現場，工人並不會根據所生產的產品與其報酬之間的差異來計算他們的勞動<sup>⑨</sup>。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國家、學校以及文化產業等總體的政治機制模糊了工人階級的視線，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建設使工人階級無法辨識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本質。而布洛維認為，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他認為工人階級的馴服和甘願恰恰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忽視的生產現場被「統整」出來的<sup>⑩</sup>，是生產的政治製造了馴服。布洛維歸納了三種調節生產政治的機制：趕工競賽（making out）、內

部勞動市場（internal labour market）以及內部國家（internal state）<sup>⑪</sup>。

「趕工競賽」，是指在真實的資本主義生產現場，工人相互競賽趕工，盡快完成生產任務的配額。趕工競賽創造了一種「廠房文化」，包括工人之間的合作與衝突，具有如下的作用：

第一，工人通過對生產過程及生產工具的駕馭獲得自我獨立的體驗，工人在趕工競賽中成為主宰者，而不是一個被機器控制的「異化者」，也不再是承擔階級任務的革命者，提高了工人的自主性。

第二，形成了種種生產時的關係，將工廠中的上下之間的縱向衝突轉變為工人之間的衝突，這在事實上掩蔽了理論家認可的工人間共同的階級屬性。制度化的趕工競賽使競賽規則也被制度化，競賽的輸贏成為趕工的目的，掩蓋了工人生產的實質，競賽本身成為目的。所以，布洛維認為趕工競賽一方面掩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時在此過程中，生產時的技術關係重新界定了生產時的社會關係，分散了衝突，產生了共識與同意。

「內部勞動市場」，是指工廠內等級分化的職務結構以及空缺職位的制度化安排。布洛維指出，內部勞動市場的維繫以及工人主動的配合基於兩個條件：一是競賽規則的合法性，相對的公開和公平很重要；二是利益的誘引，只有存在着利益的差別才會導致工人主動地納入職務競爭系統之中。內部勞動市場的存在促進了工人在工廠內的流動，一方面培養了工人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同時降低了工人與低階管理者之間的衝突，分散了工廠中的勞資對抗性；另一方面，通過職業培訓以及福利保障，在保證工人

布洛維認為工人階級的馴服和甘願恰恰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忽視的生產現場被「統整」出來的，是生產的政治製造了馴服。布洛維歸納了三種調節生產政治的機制：趕工競賽、內部勞動市場以及內部國家。

在布洛維筆下，勞動不再只是產出產品的物理過程，而是包含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三個維度的實踐性活動。在這個歷史性活動中，凝結了國家體制、市場體制、工廠體制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

生計的同時培養了工人的奉獻精神，工廠也成功地塑造了工人對工廠的認同。

「內部國家」，顧名思義，是指工廠內的國家政體形式，即在工廠企業層次上，組織、轉換或壓制生產時的關係所引發的鬥爭的制度。內部國家制度的基本內容是工人代表對於工廠管理政治的有限參與，這種參與的組織保障就是工會。但是，布洛維發現工會的實質性質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不罷工的承諾剝奪了工會和資本家討價還價的最有力的武器，加上會員資格和會費系統使工會失去了活力。有趣的是，這種轉變卻使管理階層意識到維持一個合法的工會，對於減少直接衝突、承擔集體協商的功能，是很必要的。工會能夠作為工人的申訴機制，將工人在工作現場積累的怨恨轉移到工會的會場，提供了一個發洩的安全閥。同時，工會的集體協商功能緩解了工人的怨恨以及勞資衝突。實際上，工會的集體協商往往是在保證不中斷生產的條件下同時進行的，因此，這種衝突的重組創造了工會和工廠之間基於企業生存的共同利益。

通過上述三種機制，勞動過程不再是管理者單方的強制和威脅下展開的，而是包含工人代表和管理者的集體協商與共同參與，其基礎是工廠整體利潤的增長。布洛維認為，剩餘價值的獲取需要依賴工人和資本的具體合作才能實現，這已經成為工廠企業中管理者和工人的共識，工廠內的制度化談判機制和申訴機制為工人提供了表達利益的渠道。同時，國家通過立法等手段干預勞動過程，保護工人利益，工人對資本的依賴程度下降，這促使資本勞動控制手段發生轉變：從血汗控制走向滿意控制。

當然，布洛維沒有止步於對工廠內生產政治（某種意義上屬於管理策略和工人鬥爭策略）的分析，他意圖通過生產的政治透視國家總體的政治。布洛維認為生產政治屬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微觀層面，與此對應的還存在着宏觀的層面，即國家的政治，而國家的政治是調節各領域鬥爭的「政治中的政治」<sup>28</sup>。國家的政治和生產的政治通過上述三種調節機制聯繫在一起，二者之間的關係類別界定了勞動組織的形態：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與生產組織是分離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和生產組織是融合的，國家直接取得並且分配生產剩餘。依據國家對勞動過程的干預程度及國家與生產組織的結合程度，布洛維描述了五種工廠政體的理想類型，即：(1) 市場專制體制下的血汗控制；(2) 霸權體制下的滿意控制或共識控制；(3) 官僚專制下的福利控制；(4) 官僚霸權體制下的多元控制；(5) 集體自我管理體制下的自我控制<sup>29</sup>。

市場專制體制主要形成於早期資本主義，工人一無所有，只有依靠出賣勞動力獲取生存資料，促成了資本的血汗控制。霸權體制存在於先進資本主義時期，資本通過上文所述的三種機制，「誘使」勞動與之達成「共識」，使血汗控制轉換為滿意控制。官僚專制形成於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如匈牙利），通過供給制造成了工人對國家的全面依附，國家替代市場成為資源提供者，工人的工作安全得到無條件保障，筆者稱之為「福利控制」<sup>29</sup>。匈牙利在變革後走向了資本主義，市場介入，國家特權消失，官僚專制轉型為官僚霸權體制，多元控制成為主導<sup>29</sup>。集體自我管理體制屬於馬克思設想的理想型勞動狀態，勞動演變為

生產者積極參與的自覺活動，控制手段不再必要。

因此，在布洛維筆下，勞動不再只是產出產品的物理過程，而是包含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三個維度的實踐性活動。在這個歷史性活動中，凝結了國家體制、市場體制、工廠體制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在勞動過程中，不但濃縮着控制與反控制的勞動政治鬥爭，而且還是國家政治和生產政治互動變遷的折射。由此可見，以布洛維為代表的新勞動過程理論，通過工廠政體的五種理想類型，將宏觀體制(如產權制度)與微觀的工人主體行動連接起來：以宏觀制度結構作為工人主體性行動的解釋變量，同時力圖通過微觀勞動政治透視宏觀的國家政治，從而完成了對傳統勞動過程理論的超越。

### 三 邁向多樣性的勞動過程控制

傳統勞動過程理論的核心基點是「退化」(degradation)，而新勞動過程理論的核心基點則在於「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但新舊勞動過程理論都帶有很強的「國家主義色彩」。它們認為，由「專制控制(血汗控制)轉變為霸權控制(滿意控制)」是不同國家勞動過程控制變遷的統一軌迹。新舊勞動過程理論均立足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透視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當中暗含着一個理論前提，即勞動體制只是勞動過程控制手段的變化，在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存在本質上的制度差異。但事實是，國家及其能力本身是變化多樣的，霸權體制並不是一

種自然而永恆的勞動控制形式<sup>②</sup>。而且更重要的是，新舊勞動過程理論忽略了市場體制多樣化類型差異對勞動過程控制及勞動政治類型的影響。

正如布洛維所言，對於市場中的個體企業而言，形塑企業行為取向的動力有兩個——競爭和鬥爭，個體企業除了面臨內部勞動政治外，也面臨着市場的壓力，而市場制度環境的差異極大地影響了個體企業內部勞動政治的作用形式<sup>③</sup>。

現代資本在進行勞動過程控制時，需要追求彈性的「微觀戰略」，以更好地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認為，根據資本適應市場的協調機制的差異，可以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制度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自由市場經濟(liberal market economies)；二是協調市場經濟(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這兩種不同的市場體制具有行動邏輯上的差異：

第一，在行為整合機制上，自由市場經濟主要通過科層等級制與市場競爭機制，協調市場經濟也通過科層等級制，但是多依賴於聯合而非市場競爭。

第二，在市場關係上，自由市場經濟基於正式的契約，協調市場經濟主要表現為關係性的和不完全契約。

第三，在資源交換方式上，自由市場經濟強調公平交易，協調市場經濟則強調在網絡內交換資源。

第四，在均衡達成機制上，自由市場經濟依賴市場價格信號調節企業的經濟行為，協調市場經濟主要是通過戰略互動實現均衡合作<sup>④</sup>。

簡言之，協調市場經濟傾向於採用非市場性協調機制以增強企業行為

傳統勞動過程理論的核心基點是「退化」，新勞動過程理論的核心基點則在於「去中心化」，但新舊勞動過程理論都帶有很強的「國家主義色彩」。新舊勞動過程理論均立足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透視資本主義勞動過程。

目前對勞動過程控制手段的多樣性分析基本上還是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政體」的比較研究上(如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的生產體制)，但這也說明，以勞動過程控制機制類型為重點的分析逐漸讓位於勞動過程控制模式的解釋歸因之上。

的「彈性」，而自由市場經濟則相反，主要是通過不斷解除市場管制而強化企業行為的「彈性」。進而言之，規定協調市場經濟企業行為取向的關鍵是非市場性協調機制背後參與博弈的政治力量，而規定自由市場經濟企業行為取向的關鍵則是自由市場的競爭替代邏輯<sup>29</sup>。

自由市場經濟是在一個很少直接強制干預市場的政治體制下發展起來的。在國家無行動和自由市場的條件下，使勞動過程控制主要依賴於勞資雙方的直接博弈，由此催生了勞資直接對立的格局，進而推動了工廠內工人集體行動的產生。而協調市場經濟則不同，它通常是在國家威權干預下演化形成的。國家通過對勞動過程控制的干預和管制，在勞動工會和企業之間建立了聯合協調機制，緩衝了勞方和資方的直接對立<sup>30</sup>。

因而，在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市場經濟兩種不同的市場體制下，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勞動政治也表現出不同的特徵：前者傾向於採用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策略，依託行業工會與僱主直接鬥爭，實現集體性的討價還價；而後者偏愛制度化手段(如禁止工人罷工，同時也禁止企業隨便解僱工人)，通過種種非市場協調機制，達成勞方與資方之間協調，在勞動政治上，與前者不同，行業間多處於一種「區隔主義」(segmentism)鬥爭狀態。

將市場體制引入勞動過程理論之中，可以在國家政治、市場制度類型以及勞動政治之間構建起全新的三維理論框架。這一方面使勞動過程理論由原來的縱向歷史考察轉變為橫向的空間比較，另一方面也擴展了勞動過程理論的解釋力。筆者以為，有

三個現實原因引發了勞動過程理論的轉向：

第一，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經歷了經濟發展和勞動過程重組、工人再造的雙重過程，這使以往立足於資本主義國家事實而發展起來的勞動過程理論面臨着新的解釋挑戰。

第二，全球化生產鏈條的確立，使不同國家之間的互嵌程度加深，國家之間生產模式的差異性也日益凸現。

第三，隨着工作逐漸成為一種常態，資方和勞方關係結構的均衡合作面向逐漸佔據主流，掩蓋了勞資矛盾的對立面向。

可見，在不同的市場制度背景下，控制勞動過程的機制也是不同的。當然，目前對勞動過程控制手段的多樣性分析基本上還是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政體」(production regime)的比較研究上(如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的生產體制)，但這也說明，以勞動過程控制機制類型為重點的分析(新舊勞動過程理論的主要任務)逐漸讓位於勞動過程控制模式的解釋歸因之上。

## 四 追問兼及結語

通過梳理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的發展脈絡，我們會發現，理論變化軌迹是在不斷調適其「泛階級化」立場中展開的。理論的主題也隨之逐漸發生了變化：由資本勞動控制機制的類型歸納轉變為控制達成的制度成因；由對勞方命運的擔憂轉變為勞動過程控制解構；放棄勞資整體性對立的宏大敘事轉向實在的個體企業治理層面。

所有這些理論準備為解釋中國的勞動過程轉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但是，中國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卻體現出自身的特殊性：

第一，國家力量的干預方式。國家變量在西方社會的勞動過程中同樣作用，布洛維等人認為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而言，國家的介入是外生的，是在資本—勞動的對應框架下所加入的外部力量 (external force)；而在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力量是內嵌於勞動控制過程中的。在中國的市場化轉型過程中，很多研究已經證明，國家退場只意味着國家干預手段的改變，而非意味着自由市場的建立。

第二，中國企業行為的市場環境是權力化市場<sup>⑩</sup>。國家既作為市場保護者推進市場力量的滲透，同時也作為利益主體參與市場利益的追逐，這既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由市場，也不同於協調市場經濟的協調性市場。

第三，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的轉向很大程度上因為西方世界製造產業的外包轉移，進而導致製造業工人數量下降。可是中國是世界製造工廠，而且中國的工會處於一種制度性弱勢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代工資本強勢與中國勞工弱勢成為中國勞動過程的重要特性。

當然，值得思考的是，在國家保護逐漸撤離，而市場環境又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下，工廠內的勞動政治會呈現甚麼樣的形態？工廠內的政治和國家政治又是如何互動？這既構成了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的盲點，也是我們研究中國案例的魅力所在，而這恰恰構成了勞動過程理論新的理論增長點。

## 註釋

①⑩⑫ 布若威 (Michael Burawoy) 著，林宗弘等譯：《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88；210；152-258。

② 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著，方生等譯：《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③⑤⑥⑦⑪ 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頁71-72；67-72；54；27；391。

④ 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將“the separation of the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直譯為「概念與執行分離」，但筆者以為翻譯為「設計與執行分離」更為妥貼。

⑤ 轉引自拉佐尼克 (William Lazonick) 著，徐華、黃虹譯：《車間的競爭優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35-45。

⑨ 參見 David Knights and Hugh Willmott, eds., *New Technology and the Labour Proc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88)。

⑩ 不過有意思的是，布雷弗曼關於「去技術化」的研究引起美國學界以及政界(如卡特 [James E. Carter]、老布什 [George H. W. Bush]、里根 [Ronald W. Reagan] 以及克林頓 [William J. Clinton] 等總統) 對於生產技術水平以及高技能工人的關心，導致1980年代美國政府大幅度提高對職業教育的投入以及技術升級的投入。參見 David Knights and Hugh Willmott, eds., *New Technology and the Labour Process*。

⑫ 彭恆軍：〈重返階級：「世界工廠」的必然邏輯——兼述近年來的階級理論研究〉，《蘭州學刊》，2008年第6期，頁39。

⑬ 在1998年再版的《勞動與壟斷資本》中，刊登了布雷弗曼1976年撰寫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他糾正了過去的立場，接受了「主體性維度」(subjective dimension) 的重要性。不過他認為，評價工人群體分析理論的價值要根據其是否有利於我們回答階級意識的形成問題。參見 Harry Braverman, “Two Comments”，

在國家保護逐漸撤離，而市場環境又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下，工廠內的勞動政治會呈現甚麼樣的形態？工廠內的政治和國家政治又是如何互動？這既構成了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的盲點，也是研究中國案例的魅力所在。

i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313。但遺憾的是，布雷弗曼的糾正被批評為並不直接的回應：一是他關於主客觀的劃分損害了工作作為一種「鬥爭的工具」(a tool of combat)的功能；二是他沒有說明在勞動剝削中主體性是如何糾纏於其中的。後來，布洛維在其著作中（尤其是《製造甘願》一書），完成了這第二點理論任務。

⑭ Richard Edwards,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⑮⑯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5).

⑰ 布洛維通過勞動過程理論「三部曲」：《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生產的政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工廠政體》(*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以及和盧克斯(Janos Lukàcs)合著的《輝煌的過去——走向資本主義的匈牙利的意識形態和現實》(*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構建了他完整的勞動過程理論框架。

⑱ 參見布若威：《製造甘願》。

⑲ 參見布若威：《製造甘願》；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Michael Burawoy and Janos Lukàcs,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英國歷史社會學家湯普森或許不會同意布洛維的觀點，他用社會歷史的方法，引入「階級經歷和階級行動的要素」，把勞動過程中的工人擴展到整個生活歷程中的工人，認為(英國)工人階級的出現是工人複雜而矛盾的階級經歷的產物。參見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著，錢乘旦

等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下冊(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⑳㉑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26; 21-37.

㉒ Michael Burawoy and Janos Lukàcs, *The Radiant Past*, 50-89.

㉓ 在國家社會主義背景下，福利控制既不同於血汗控制，也不同於滿意控制，是沒有市場介入的情況下形成的勞動過程控制類型。

㉔ 布洛維定義變革後的匈牙利工廠體制之所以依然用「官僚霸權體制」，是因為國家介入工廠生產過程的影響根深蒂固，存在着路徑依賴效應。筆者以為，布洛維如此定義乃是基於「國家—社會」二元框架基礎，他認為在匈牙利變革過程中，一方面國家「粉飾社會主義」激發了變革；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團體運動生產了公民社會，對抗國家的壓迫。參見Michael Burawoy and Janos Lukàcs, *The Radiant Past*, 90-134。

㉕ 李潔：〈重返生產的核心——基於勞動過程理論的發展脈絡閱讀《生產政治》〉，《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頁234-42。

㉖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

㉗ Kathleen A. Thel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㉘ 具體討論可參見王星：〈勞動安全與技能養成：一種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頁107-13。

㉙ 王星：〈調控失靈與社會的生產——以房地產業為個案及個案拓展〉，《社會》，2008年第5期，頁139-64。

王 星 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講師，南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社會政策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